

新都文史

第三輯



86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四川省新都县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新都文史

第三期

中国民主政治协商会议
四川省新都县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EA48/15 前 言

《新都文史》第三期是反映新都和新繁解放前后的政治、军事情况的专集，重点是一九五〇年。为此，我们邀请了当年在新都、新繁两县工作的部分老同志举行了几次座谈会，并派出人员到外地访问了多位当时的一些负责同志。这些老同志，多数已离退休，但仍满腔热情，纵谈当年的亲身经历，积极为本刊写稿，我们谨致以衷心的感谢。

本期所发表的十几篇回忆文章，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建国初期开创新都、新繁局面的艰苦复杂性，但还是不够全面的。我们敬望当年两县的老同志继续为本刊撰稿，使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土地改革这一伟大的反封建斗争的具体情况常留人间，使子孙后代永志不忘，从而推动祖国统一，振兴中华的大业向前发展。

对于若干史实，我们虽然尽可能核对了当年的报刊及档案资料，但因年代久远，人物星散，未能尽如人意。如有讹误，欢迎知情者及时指正。

本刊编编部

一九八六年十二月

目 录

✿ 摧毁旧统治，建立新政权 ✿

- | | | |
|---------------|-------|------|
| 余秋里同志在新都 | 本刊编辑部 | (1) |
| 我在新都工作的回忆 | 宋锡九 | (15) |
| 在新繁县的斗争 | 王瑜山 | (37) |
| 新都县人民政权的建立和巩固 | 张毅 | (46) |
| 迎解放 | 叶崇芬 | (65) |
| 几则往事 | 戴志和 | (69) |

✿ 翻天覆地的斗争 ✿

- | | | |
|------------|-------|-------|
| 永兴乡征粮与剿匪片断 | 蔡自立 | (74) |
| 四大运动亲历记 | 刘冠群 | (83) |
| 新繁剿匪记实 | 冯化民 | (91) |
| 参加革命工作的第一步 | 陈德贤 | (95) |
| 活捉廖宗泽 | 本刊编辑部 | (100) |
| 廖宗泽其人 | 辛智 | (102) |
| 吴万年脱险 | | (110) |

✿ 革命英烈 ✿

- | | | |
|--------------|-----|-------|
| 万安乡征粮工作组遇难始末 | 黄世忠 | (112) |
|--------------|-----|-------|

忆袁斯尧……………何 穗……(119)

杂 记

新都支前二、三事……………赖戎生……(128)

禁烟杂忆……………刘宗儒……(131)

附录：

解放初期新都及其周围地区的

匪特暴乱资料摘要……………县志办公室…(135)

余秋里同志在新都

《新都文史》编辑部

一九四九年十二月，贺龙司令员率领十八兵团及一野主力一部，突破巴山秦岭天险，横扫成都平原。二十七日，司令部进驻新都。三十日，举行了解放成都入城式。成都战役取得了辉煌胜利。当时，余秋里同志任十八兵团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并任新组建的川西区党委委员和组织部副部长。

川西区党委刚刚开始工作，便面临一系列重大问题：几十万投诚、起义和被俘的国民党军队急待安顿和整编；进军西康和进军西藏需要及时的、充足的后勤支援；各地的叛乱破坏活动必需彻底肃清；工农业生产要尽快恢复；工教人员的生活应该得到保障。这一切，都离不开粮食。单以供应军需一项来说每天就得拿出一百多万斤大米。成都解放前夕，国民党溃军蜂集，地方仓库里的粮食早已被吃、抢、偷得所剩无几了。从新都一个县的资料来看，库存粮食只有十几万斤。各县情况也差不多。粮食成了川西区党委考虑的关键问题，粮食是牵动全局的十万火急问题。

一九五〇年一月上旬，余秋里在成都“连板凳都没有坐热和”便到新都县来了。他是区党委分工到几个县检查征粮工作，总结经验，指导全区工作的。当时的新都县和新繁县（现合并为新都县）解放不过十多天，百废待兴，百事待举，南下干部每县不过二十来人。后来能够顺利完成征粮任务，打开工作局面，这是与川西区党委、温江地委的直接领导和

秋里同志亲临第一线运筹指挥分不开的。

一九五〇年上半年，余秋里同志大部分时间都是住在新都县。他的思想、精神和作风给新都干部和群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三十六年匆匆过去，余秋里同志当年活跃在新都农村的形象仍然牢记在人们的心中。本文便是根据那时候在余秋里同志身边工作过的一些同志的回忆，并参考了档案材料和报刊资料(包括余秋里同志亲自撰写的文章)整理而成的。

共产党人是不怕死的

余秋里初到新都时，新组建的新都县委只有三个人：宋锡九、张毅和公安局长李毅。地方封建势力还未受触动，隐患随时可能爆发，许多群众虽然渴望解放，但由于反动分子的谣言和威胁而顾虑重重。余秋里一到，便投入紧张的工作。他听取了县委的汇报，并共同研究了征粮工作的部署。他强调说：“关键是要抓住政权，要稳住局势，要压倒反动分子的气焰，要依靠群众，如果稳不住局势，农村中到处在捣乱破坏，征粮就难办了。”

初步安排停当后，余秋里便要亲自到农村去。宋锡九阻止他说：“农村情况复杂，你不能去。”余秋里说：“情况复杂，我更应该去；不去，怎么能知道有多复杂呢？”他便带着郝世芳、王彦功两位同志和两位警卫员下乡了。他先后到过军屯、弥牟、永兴等八九个乡，跑遍大半个县，也常常住在乡下。他到茶馆里同人们聊天，他到群众家中了解情况。他似乎没有思考他的处境有多么危险，担任保卫工作的同志却处在高度紧张之中。

新都城北十六里有个弥牟镇，弥牟镇上有个“李天王”，名叫李金贵，土匪出身，当过国民党工兵团长和一二六师川北密察主任，是袍哥“雄图社”的舵把子，临解放时又担任了“西南游击队纵队司令”。他枪多势众，称霸一方，群众说：“李金贵吐泡口水都能淹死人。”解放军一到，他便逃到什邡县山中去了。但他在弥牟乡爪牙密布，反动势力依然存在。他的儿子李静修是伪乡长，没有跑。

余秋里到弥牟镇，便住在李金贵家中，弥牟工作队长薛勇同志很紧张。白天，余秋里到哪里，他跟到哪里；夜晚，余秋里睡里屋，他就睡外室。工作队把李静修掌握住，警告他：“工作干部的安全，你要负责；出了问题，你跑不了。”

余秋里在镇上，在农民院子里，找群众谈话，三个五个，他讲，也听大家讲，有一天，薛勇跟着他出去，发现前边有情况，对他说：“有土匪！”不让再往前走。余秋里说：“真是草木皆兵！土匪有什么可怕的？”余秋里不顾个人安危，深入虎穴，摸清了当地情况。然后，余秋里对工作队长薛勇和副队长李柏芝说：“不能随便抓人。只要李金贵一个人还在外头，你抓他十个也不顶事。要做上层工作，从政策上攻心，从生活上照顾。可以放出话去，只要李金贵回来，改恶从善，我们欢迎；他吸鸦片烟，也可以照顾；在外边是没有出路的。对下边的人，要利用矛盾，分化瓦解，各个击破。要把群众发动起来，搞个农会，但目前不要公开。”

弥牟镇没有抓人，但局势稳住了，暴乱没有搞起来。

李柏芝是个年轻姑娘，她找到李金贵的一个小老婆做工作，晓以大义，解除顾虑。工作队又做了下边一些人的工作。人民政府的政策通过各种渠道传达到李金贵躲藏的地方去。

了。不久就产生了效力。李金贵终于带口信回来试探：如果他返回新都，能不能保证他的生命安全？

薛勇和李柏芝同县委汇报这一情况。余秋里同志在座；每次县委会议他都要参加。县委明确回答：只要李全贵回来改过自新，可以既往不咎。余秋里又再次表了态，同意县委的意见，并且补充说：“可以照顾他的生活习惯，准许他抽鸦片烟；但要老老实实，不准捣鬼！”后来，李金贵在形势逼迫下，几经犹豫，终于回新都了。

余秋里在各乡，不但亲自做群众工作，还亲自做旧乡保人员工作。他在军屯乡，夜晚和旧乡长住在一起，一方面是防止此人捣乱破坏，另一方面也容易当面晓谕政策，指明出路。

一月十五日，新都县召开第一次农代表大会。余秋里和县委共同研究决定，乡保人员一百五十人也列席了会议。会上，宋、张两位县长声严色厉地对旧乡保人员训导，交代政策，指明只有将功赎罪才是唯一出路。宋锡九说：“我们的工作干部到哪个地方，那里的乡长、保长就要对他们的安全负责；出了问题，我首先就要找你们算帐！”接着，余秋里作了长篇讲话，说了几个小时，他以激动而高昂的声音对农民代表说：“宋县长给你们撑了腰，你们就不用怕了。他们（反动派）敢杀你们一个，我就杀他十个，杀他一百个！”他又转向旁听的旧乡保人员说：“国民党八百万军队都被打垮了，你们算个啥？你们莫看我只有一支胳膊，我们共产党人是不怕死的！你们如果要打，也可以试一试看！”

旧乡保人员一个个低着头，威风扫地。农民兴高采烈地说：“这批人过去威风凛凛，谁还能说？他们从来没有低过

头。现在，我们能说话了，能参与政府办事了。”

春节前后，新都县周围发生了大规模匪特暴乱，石板滩、龙潭寺一带，叛匪猖獗，波及到木兰乡、太兴乡一带，情况紧急。边缘一些乡的工作干部背上铺盖卷撤回县城，聚集在县委院子里。余秋里看到了，问清情况后便大声喊道：

“警卫员！跟我走！”他又吩咐多带些手榴弹，便带着两三个警卫员坐上吉普车，到前沿去了。他在永兴乡梓橦官碉堡里住下来，撤下来的干部看到余政委亲上前线，也都返回乡下，坚守岗位。余秋里在乡下亲自指挥，终了稳住了阵脚。

四月二十四日（阴历三月初八），石板滩、龙潭寺、门坎坡大股匪徒进攻木兰乡，县大队与叛匪猛烈交火，虽然杀伤一些匪徒，但由于敌众我寡，退过沱江，新都县城已处于危急之中。急报传来，余秋里立即在县委小会议室与宋锡九、张灝等紧急会商。一幅地图摊开在会议桌上，新都县城南方，沱江从西向东蜿蜒而过，最近的渡口泥巴沱离县城只有四公里。余秋里右手的中指连续点着泥巴沱，桌子发出“笃、笃、笃”的敲击声。“一定要守住泥巴沱！”余秋里斩钉截铁地对县委下达命令：“决不能让叛匪过河！撤下来的县大队沿河布防，不准再后退一步。你们马上通知随营学校，马上开到泥巴沱去，守住这个渡口，随时汇报情况。电话机要派干部昼夜值班。我负责从成都方面调部队。”他用手在地图上从西向东划说：“由这里打过去，消灭这些王八蛋！”会议很快结束，余秋里立即坐上吉普车飞驰成都调兵遣将去了。

四月二十五日上午，占领黄牛店的匪徒正在狂吠“我们胜利了”的时候，余秋里调动的一支解放军已经从成都出

发，兵分两路：一路过二台子后，经鲁家幺店子直趋黄牛店；一路绕至新华村，从敌背插上黄牛山。敌人陷入了余秋里摆布的天罗地网。一阵迫击炮火打得敌人尸横遍野，两路夹击当场击毙匪首严斯和及匪徒五十余人。

石板滩一带叛乱的数千匪徒，虽然嚣张一时，却始终没有越过沱江一步，至六月份便全部被我剿匪部队歼灭了。

新都县境内反革命分子准备响应石板滩叛乱的阴谋破产了，县境内终于没有出现重大的暴乱。

县的匪情就严重得多了。二月初，清白、高宁、新农、万安、利济、龙桥、崇义等各乡相继发生匪特暴乱，残酷杀害征粮干部，仅新农一乡，十一日一天被杀干部及农民代表即达十四人。土匪在各乡胁迫群众“消灭解放军”，“任何人不准送粮给解放军，哪个敢违抗，就要杀他的人，烧他的房子”。土匪还组织围攻县城，打到了城外。成彭公路沿线都有土匪，交通中断。二月二十三日，解放军独一师陈副师长被土匪杀伤，战士三人被残杀。成千匪徒在龙桥公路上袭击解放军。

哪里出现紧急情况，余秋里就到哪里去。在新繁乱匪如麻的那段时间里，余秋里又从新都抽空到了新繁。在这里，他见到了西南军区派驻新繁的军事代表王瑜山。王瑜山也是八路军一二〇师的老干部，他这时只带着一个营的队伍对付着十分严峻的局面。余秋里到来，使王瑜山得到极大的鼓舞和安慰，他可以直接得到首长的及时指示处理复杂的叛乱和潜伏的隐患了。他们住在四周都是叛匪的新繁城中，听着土匪的枪声，漏夜研究剿匪行动计划。他还常常和王瑜山一道下乡深入匪区调查匪情。王瑜山是一员勇将，他腰插左轮，手提

连枪，时时保卫着余秋里。王瑜山的警卫员王进宝是个好枪手，也和余秋里的警卫员紧跟着他们。有一天，快走到南桥附近，王瑜山突然发现前面坟地里有一些包白帕的人头晃动，便一把拉住余秋里，叫道：“有土匪！”正说时，土匪已开枪射击了。王瑜山喊王进宝：“打！给他一梭子！”叭，叭，叭……王进宝狠狠地扫射过去，一群土匪没命地狼狈逃窜。余秋里哈哈大笑起来说：“乌合之众，乌合之众！”他就是这样深入虎穴，摸清敌人的虚实，了解到叛匪虽然人多势大，其实是不堪一击的。余秋里知己知彼，运筹帷幄，川西军区和地方军民紧密配合，嚣张一时的新繁匪特叛乱迅速被镇压下去了，这就为征粮工作扫除了障碍。

靠党的政策去发动群众

余秋里到新都抓征粮工作，遇到的问题很多，一是任务紧迫，二是对新区的情况不熟，三是干部少且弱，四是群众尚未发动起来。

面对千头万绪，余秋里指导着新都县委紧紧抓住组织和教育干部队伍这一条。在当时，新都县征粮工作干部组成的情况是：县上的干部十人，县上的旧职员二十七人，由军管会派来的前临汾军大学生二十八人；财政处派来的旧职员七十四人，新参加工作的学生五人，一共一百四十四人，大约每保只能有一名干部。对于这些干部，余秋里和县委都在大会、小会上对他们进行形势教育、政治教育和思想、立场、观点、方法的教育。特别是对于一百零一名旧职员，余秋里更是特别关心，对他们说：“只要你们跟着共产党，好好干

工作，党的政策是全部包下来，职务和薪金都是有保证的。老区来的干部是供给制，对你们实行薪给制。有什么困难，可以提出来，政府尽可能解决你们的正当要求。”他特别强调，到乡下工作，不能用国民党那一套办法，要发动群众，依靠群众。这批干部于一月十七日先后全都到达农村开展工作。其中六名团、营级干部分片包干，负责督促、检查指导工作。余秋里又深入到乡上、保上，听取干部汇报。干部汇报中如果使用了“大概”“前几天”“有人说”之类的字眼，他就要问个一清二楚：“究竟是多少？”“哪一天？”“谁说的？”并且教育干部，了解情况要具体，不能道听途说；发现问题就耐心教育，及时纠正。

有一次，新区青年干部戴子和向余秋里汇报征粮情况后，余秋里问：“第二次调整后，你那里是增加了，还是减少了？”戴子和汇报说减少了两万斤，说明了减少的原因，还说明了这是经过群众评议的。余秋里说：“不对！按照你那里的情况，不应该减少，而是应该增加。”他和戴子和算了合理负担的账，证明了没有贯彻各阶层负担比例。戴子和服了。余秋里进一步教育戴子和说：“我们说要有群众观点，就是心中要时刻想到群众的当前利益和长远利益；依靠群众，就是要用党的政策去发动群众，领导群众；党的政策就是代表群众的现实利益和长远利益的；政策贯彻了，群众发动起来了，就拥护你了；走群众路线，不是当群众的尾巴。你们年轻干部，要看到群众的长远利益，不能用小资产阶级的眼光看问题，恩赐观点，尾巴主义都是不对的。”

一九五〇年上半年新都征粮一共开了四届农民大会，余秋里都亲自参加了，并且每次都抓住关键问题讲了话。

第一次，一月十五日，布置征粮工作。

第二次，二月二十四日，着重解决合理负担，调整征粮数额。

第三次，五月九日，检查完成情况，弥补调整后亏额，进行复查。

第四次，六月二十五日，肯定成绩，纠正偏差，夺取全面胜利。

新都县的征粮工作终于圆满地比较快地完成了。这不是在一般情况下完成的，而是在刚刚解放困难重重的情况下完成的。余秋里同志从始至终提纲挈领掌握着这一项工作，指导县委贯彻党的政策完成了非比寻常的使命。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四月七日举行的新都县第一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那次会议是在桂湖公园举行的。川西区党委书记李井泉和余秋里同志都在会议上讲了话。余秋里的讲话从国民党的“四大家族”讲到新旧社会的对比。他说：“现在是人民当家作主的时候了！国家大事该由你们来关火了！”

“关火”是“管事”“说了算”的意思，余秋里讲话喜欢运用他刚学到的人民容易听得懂的方言词语。他也常常教育干部，和群众谈话，语言要通俗易懂。他的讲话激起代表们的阵阵掌声。有一位读议案的同志说的是山西话，群众听不懂，余秋里就建议换一位四川同志去念。在这次会议上，余秋里重点讲了剿匪、征粮、生产三者的关系。他说：“土匪、特务是新都人民当前最凶恶的敌人，全县人民动员起来，清匪肃特，完成公粮，才能发展生产。人民政府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在封建制度下解放出来的新都人民，第一次以主人翁的身份参与讨论国家大事。一位名叫孟吉喜

的农民代表说：“我们人民好比碾子，共产党好比水；水来了，我们才能转得起来！”一些农民代表说：“那位独手杆余政委讲的话，说到我们心坎上了。”

余秋里非常重视总结经验。他到新都不过半月，便写出来了一份约四千字的《关于新都征粮的工作报告》（载一九五〇年二月四日《川西日报》，二月五日续完）。这份报告是他白天收集情况，夜间进行整理，经过几个通宵，亲自写出来的。这份报告介绍了新都征粮工作的组织情况，发动群众的经验，指出当前存在的几个基本问题和几个要解决的具体问题。川西区委对这份重要报告的批示说：

各地委、专署、各县委、县政府及各征粮工作队同志们：

区党委派余秋里同志到新都检查征粮工作，发现有许多问题急需解决，其中特别是负担不平衡，应引起各地的注意。这一方面是区党委缺乏对上述问题的考虑，另一方面则是时间紧迫，干部少且弱，为此行署已拟指示告各地改正。各地党委、政府及筹粮工作队亦应抓紧检查征粮工作中之缺点，以免使农民发生反感，甚至被特务及反革命分子所利用，并将此报告在川西日报发表，引起你们注意。

中共川西区委

二月二日

余秋里同志在新都抓征粮工作的经验，对推动川西各县工作产生了很好影响。余秋里还常到周围一些县去检查了解，及时总结经验，指导全区征粮工作。例如，余秋里和高鸿光两同志谈华阳县十七天突击征粮工作经验（见《川西日

报》一九五〇年六月三日)就为短期打开僵局,找出问题症结提供了宝贵的借鉴。

扎根实际,放眼全局,余秋里同志的思想境界和工作方法都是值得我们永远学习的。

我是人民的勤务员

余秋里在新都的艰苦朴素、平易近人、一心为革命事业服务的作风和精神,在新都人民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到新都乘坐的是一部旧吉普车。到乡下去,有些地方那时候连乡村公路也没有,他就步行,有时甚至是独手骑一辆旧自行车。身边只有两三个秘书和警卫人员。他到军屯乡时,县委安排该乡的武装队长赵光华负责保卫工作。赵光华是位老实农民,他不认识余秋里,领导上也只给他说“保卫一位首长”,他不知道“首长”有多大。心想这位“首长”大概比书记要大一些,但大多少呢?有一天,他天真地问余秋里:“你当的啥子官哟?”余秋里看看这位憨厚的农民笑道:“我当的是人民勤务员。”赵光华仍然没有搞清楚,又问:“你是啥子阶级?”余秋里说:“我是无产阶级,就是你们四川话说的‘千人’,我们是一样的,都是为了给受苦人打江山!”余秋里确实和贫苦人民是一样的,一块住,一块吃,一块谈家常,没有半点官架子。他常常到乡场上的茶馆里和人们聊天。茶馆里啥人都有,这可把赵光华急坏了。他紧张地布置民兵密切注视动静。余秋里却和茶客们天南海北,谈笑自若。人们也不感到他是个大官,闲谈中就告诉他农村里的真实情况。有的群众向他反映,征粮负担不公平,榜上没

有保长的名字。”有的问：“交了粮，地主还追不追交旧欠的租子？”有的反映，马料比米贵，农民交草交料比交粮困难。有的揭发匪特、地主恐吓农民的谣言。余秋里既得到第一手资料，又及时作了思想工作和解答了问题。他是置身于群众之中，在与群众谈笑之间来作群众工作的。慢慢地，群众也就知道他是“余政委”了，并且相互传说“他与贺炳炎就是贺龙的左右二膀”。由于他的随和，没有官气，贫苦农民更亲近他了。

在弥牟乡，他要工作队长薛勇与他同住一个房间，薛勇不敢答应。余秋里说：“这有什么关系，都是革命同志嘛！”

农村中的生活是艰苦的，伙食很差。工作干部李柏芝想办法到弥牟镇上买了些菜，烧了鱼和肉给余秋里送去。余秋里批评说：“你这是干啥？我是来工作的，不是来享受的。端回去，以后再不许这样搞了，你们吃啥我也吃啥。”

余秋里喜欢喝点酒，但喝得很少。在新繁时，他和王瑜山白天下乡跑累了，回到住地原县政府（今东湖公园前）内两个人一盘白酒，一碟胡豆或油炸豌豆，便喝开了，其它什么菜也没有。他们也就这样边喝边商量工作。

余秋里常常通宵达旦地工作。天亮了，困得不能睁眼了，他就在椅子上闭上眼睛打个盹，睡上一两个钟头。睁开眼就叫：“王瑜山，肚子饿了，弄点什么吃的吧！”胡乱喝上一碗稀粥，精神又来了。“走吧，今天到哪里？”于是又下乡去了。

余秋里作记录，写报告是不假手别人的。他常常是笔记本搁在右腿上，一边听，一边用仅存的右手记下来。他的寝室